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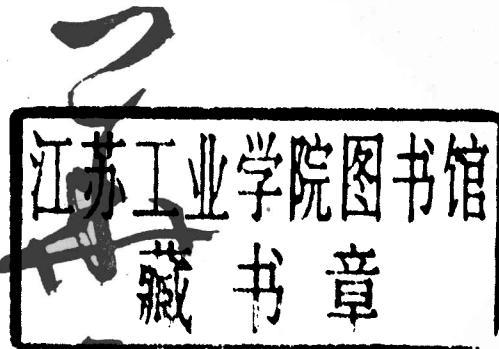
# 天地

刘文玉 主编

沈阳出版社



顾问	林声	张毓茂
主编	刘文玉	
副主编	王守勋	
沈阳出版社		



天地

(辽)新登字12号

华夏天地

HUA XIA TIAN DI

刘文玉 主编

---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13纬路19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1994年8月第1版

印张：8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210千字 印数：1—1000

---

责任编辑：守勋 健中 封面设计：冯守哲

责任校对：张 燕 插 图：张君华

版式设计：方 之

---

ISBN 7-5441-0218-1/I·46 定价：15.00元

## ● 目录

祖国文化 无法分割	张毓茂	1
林声和他主编的《中华名匾》	苏 宏	7
《中华名匾》跋	林 声	10
毛泽东恭写碑文	彭图湘	12
争画	冯峰鸣	14
文坛怪杰萧军	张毓茂	19
爱诗梦诗的岭南人		
	[泰] 许心怡	27
朗诵诗在美国	刘文玉	40
在美国一个大家庭中		
做客	刘文玉	45
北国纪行	雪 柔	48
张氏家庙沧桑	赵 杰	53
重现帅府宴	姜 苏	58
张学良家族近况	高 阳	59
祖墓与元帅林	刘志清	61
蒋介石的“亲信”	王 驹	69
从新加坡武吉知马山麓		
下说起	[新加坡] 詹鼎飞	75

梦莉的文学成就及传略

..... [泰] 曾 天 88

在水一方 ..... 吴佳舜 96

沈阳怪人张祥 ..... 王守勋 99

刘少奇九个子女的今昔

..... 曹 路 102

黄帝陵的传说 ..... 柏 明 108

溯源与寻根 ..... 狄尔本 111

战后新加坡华人家庭的

变异 ..... 崔贵强 116

马华文学史的先驱 ..... 萧 村 121

荒野·白骨·慰灵人 ..... 顾兆和 124

八埠来货 坐地生金 ..... 姚维安 130

不到西安等于不了解中

国 ..... 才伟辉 138

世界鳄鱼大王——杨海

泉 ..... 剑 琴 143

殷殷报国情 ..... 丘 良 149

饮誉海内外的关东辽菜

..... 徐光荣 154

五爱商战 ..... 木 青 161

“老边饺子 天下第一”

..... 邹宏 世明 177

“龙口”传人 ..... 杨龙厚 李群 182

追求卓越的人 ..... 聂立珂 196

御厨沉浮 ..... 吴正格 202

●張毓茂

# 祖国文化 无法分割

## ——关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随想

我教书时，经常讲授的课程是中国新文学史。这是一门文科学生必修的基础课。这门课的教材，从50年代初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80年代初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40多年来出版了几十种。它们实际上纪录了新文学研究所经历的曲折道路。10年改革的新时期，这门年轻的学科有了长足的进步。诸如对新文学性质的认识，规律的把握，研究视野的开阔，学术空白的填补……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我和新文学研究的同行们一样，深感这门学科在内容上始终存在重大的缺漏：就是作为中国新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新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一直付诸阙如。而它们理当纳入祖国文化宝库之内，是不应割裂出去的。

先说台湾的新文学。台湾自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便被日本所占领，直到1945年抗日战

争胜利，才结束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苦难命运。50年来，政治上被压榨，经济上遭掠夺，文化上受到严酷的精神奴役。尽管如此，台湾省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前仆后继，英勇奋战，始终顽强不屈。与此同步，台湾人民在文化战线上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日军占领伊始，台湾人民就开展了声势壮观的“汉学运动”，以保持祖国文化传统，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1919年“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对台湾的文化界产生强烈的影响。1919年秋，台湾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响应“五四”运动，取“同声相应”之意，成立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声应会”，同年末又成立了“启发会”。1920年1月，又在“启发会”基础上，成立了“新民会”。这一组织明确提出反对日本的“同化主义”，启迪民智，加强宣传，为争取民族自主而斗争。他们仿照祖国大陆陈独秀等文化先驱创办的《新青年》，于1920年7月创刊了《台湾青年》，在创刊号的“卷头语”中，号召台湾同胞觉醒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蚀，追求民族文化的革新，通过台湾同胞的“自新自强”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他们也积极鼓吹文学革新。在《台湾青年》上接连发表了《文学与职务》（陈忻）、《实社会与文学》（甘文芳）、《日用文鼓吹论》（陈瑞明）……等颇有影响的文章，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传播新思想，把大陆上汹涌澎湃的文化启蒙和文学革命运动引到台湾岛上。其后，以张我军为代表的台湾省的新文学家与封建复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是大陆上陈独秀等文学先驱与林琴南等封建余孽论战在台湾的延续。双方各自的主张，以至文章的用语和口气都与大陆上发生的情形相同。这场论战也同样推进了台湾新文学的发展。

1922年4月，《台湾青年》更名《台湾》，第二年4月，

《台湾》发行增刊《台湾民报》。这份刊物有力地推动台湾新文学的成长，它不但发表了大量提倡新文学传播新思想的论文，而且推出一系列显示新文学实绩的创作。新诗方面有张我军的《沉寂》、《无情的雨》、《烦闷》、《乱都之恋》……以及崇五的《误认》、《旅愁》，杨华的《小诗》等，小说方面有赖和的《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弟兄》、《黄昏的蔗园》，张我军的《贾彩票》、《白太太的衷史》……等。在散文和戏剧方面也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新文学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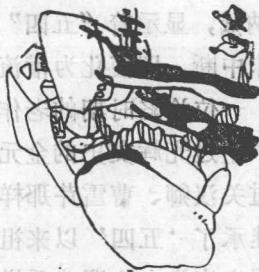
到了30年代，台湾成立了众多的新文学社团和创办大批的新文艺刊物。如南音社及其《南音》半月刊，台湾艺术研究会及其《猛尔摩沙》，台湾文艺协会及其《先发部队》等。其它如《伍人报》、《洪水报》、《台湾战线》、《晓钟》、《明日》、《现代生活》、《赤道》……等刊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革命文学的倾向。1934年春天，台湾各文艺团体的作家联合起来，成立了台湾文艺联盟。这是台湾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近似大陆上同时出现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它的出现标志着台湾新文学运动发展进入高潮。它的会刊《台湾文艺》被称为“寿命最长，作家最多，对于文化影响最大的杂志”。许多杰出作家的优秀作品不仅在台湾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在大陆、在国外，都得到高度评价。像张我军、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等台籍作家，都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们的作品，诸如《乱都之恋》（张我军）、《一杆称仔》（赖和）、《送报夫》（杨逵）、《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等都不愧是传世之作，反映了台湾人民苦难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坚持和发展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些作品应该与《狂人日记》、《女神》、《尝试集》、《死水》、《沉沦》、《倪焕之》、《子夜》、《家》、《骆驼祥子》等杰作一并载入中国新文学史册。

至于沦陷区文学，也一直被排斥在新文学视野之外。我们且以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为例。实际上，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拼命鼓吹和扶植封建法西斯文学，但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抗日文学，始终存在着，斗争着，发展着！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就波及到了东北。当时在吉林有白杨社，在沈阳有启明学会等文学社团，分别出版了《白杨》和《启明旬刊》等文学刊物，在读者中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20年代后期，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关怀和指导下，左翼革命文艺运动开始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1928—1930年间，仅在沈阳一地陆续出版的文学刊物，便有15种之多。其中如《关外》、《冰花》、《辽风》、《劲草》等刊物，都曾大力宣传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以爱国为宗旨的民族主义文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东北人民开始了14年的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在这漫长的黑暗年代里，党的和非党的革命文艺家，同东北广大人民一起，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浴血搏斗。他们不但用笔，而且用刀枪奋战，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以哈尔滨为活动中心的革命作家巴来（金剑啸）、洛虹（罗烽）、黑人（舒群）、姜椿芳、刘莉（白朗）、三郎（萧军）、悄吟（萧红）、山丁（邓立）、金人、陈提等。他们以《夜哨》、《文艺》、《荒田》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战斗倾向的作品，向敌人勇猛冲击。如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小说《星期天》；萧军的《烛心》、《孤雏》；萧红的《夜风》、《看风筝》、《麦场》（即后来轰动上海文坛的《生死场》的一章）；罗烽的《口供》、《两个阵营的对峙》等等。他们当中许多人（如萧军、萧红、罗烽等）后来撤入关内，同上海左翼文艺队伍汇合，形成了30年代崛起于上海文坛的“东北作家群”。而留在沦陷区的作家们，则在敌人血腥统治下继续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反帝爱国的斗争。尽管史料已严重散失，但据

仅存的残缺资料，仍可看到他们活动的成绩。比如1933年一年之内的文学社团就有17个。其中冷雾社、飘零社、新社和白光社都非常活跃，出版《冷雾》、《飘零》、《罗丝》、《白光》等刊物。此后虽然斗争日益艰苦，但战斗在沦陷区的作家们仍然以各种方式从事反帝爱国的文艺活动。在当时的《凤凰》、《新青年》、《明月》、《文丛》、《作风》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品。这时期著名的作家有山丁、袁犀、沫南、秋萤、金音、小松、但姊、梅娘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绿色的谷》（山丁）、《河流的底层》（秋萤）；短篇小说集《泥沼》（袁犀）、《小工车》（秋萤）、《山风》（山丁）、《第二代》（梅娘）等。他们当中某些人在激烈斗争中，虽然也曾消沉、落伍，但就总体来说，始终是不断前进的。当然，由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提出的文艺口号（如“乡土文学”）也许不够明确尖锐，他们作品的情调有时不免伤感悲观……总之，他们同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相比较，确是显得幼稚、薄弱一些，有着这样那样的失误。然而，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暗夜里的灯火，沉寂中的呐喊，显示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大潮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并未中断，即使化为潜流吧，它也是在滚动着，前进着，呼啸着！一位沦陷时期的老作家回顾说：“当然，14年的沦陷区并没有产生过光辉文史的金元杂剧和清朝一代的古典名作，也没有出现过关汉卿、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但从这一时期的文学看，都继承了‘五四’以来祖国文学革命的优良传统，绝大部分都能从现实出发，有明确爱憎，比较接近劳苦大众。对被奴役受迫害者有强烈的同情。因而敢和敌人站在对立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在深重民族灾难里，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悲惨，为我们展现出当时统治者宣扬为‘王道乐土’的真实图景。从另一角度出发，对英勇杀敌的抗战英雄，也有过热情洋溢的歌颂。”“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文学，就其主流或总的航向看，

基本是健康的，是倾向革命的。”不消说，这不是定论，但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无疑是有启发的。它提醒我们注意：在那么一大片国土（东北）上，在那么漫长的时期（14年）里，曾经有过珍贵的文学遗产！

（张毓茂现为沈阳市副市长，现任民盟中委和辽宁省副主任委员）



《晋书》载：“王羲之尝与同志游山，见一老姥以小车运薪，问其故，答曰：‘家有五口，衣食不足，每常取之于人，今不堪负。’羲之深以为之感叹，乃停书就之，写毕，还其车。姥大惊问所求何物，羲之笑而不答。姥后问其夫，夫曰：‘但得王羲之字，可也。’”

王羲之，字逸少，东晋书法家，有“书圣”之称。他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他不仅擅长书法，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在《晋书》中的这段经历，体现了他为人谦逊、乐于助人的品质。

● 苏宏

## 林声和他主编的《中华名匾》

作为原辽宁省副省长的林声，人们十分熟悉，而作为颇有艺术造诣的学者林声，熟悉的人并不多。他那朗朗上口、韵味十足的诗作曾打动很多读者。然而，一部轰动亚洲汉字圈国家的《中华名匾》由林声主编的事实，是许多读者不曾想到的。

在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林声的办公室，一部《中华名匾》把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思绪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了……

“林声同志，匾额，以其独特的文学形式，把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中的辞赋诗文、书法镌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是您主编的《中华名匾》，使千百年来‘寄人檐下’默默无闻的匾额，重见天日，您为子孙后代……”我开门见山，立刻引起林声谈话的兴趣。

“几年来，我曾游览拜读过一些名匾。每当我站在匾下，匾额那哲理深奥、教义简明，启我以智慧，享我以美艺，增我以国思的感染力常使我情动于衷。我看到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几经折腾破坏和保护不善，逐年减少，殊感痛心。为

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我在六年前，开始构思主编一部《中华名匾》。”林声同志这激情洋溢的话语，蕴足了智慧的色彩和文化气息。

为这部传世之作的诞生，他踏石涉溪，不辞辛苦，先后考察了全国16个省市名山大川、古迹名胜的名匾。只要了解到匾额的信息，他都一处处地寻觅，对收入《中华名匾》每块匾额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认证。

在湖北省武当山的天柱峰巅上，有一座始建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的“金殿”。为获得“金殿”上匾额的第一手材料，林声不顾病后虚弱的身体，披着晨光里的霞彩，向海拔1612米的主峰攀登。经过5个多小时的跋涉，林声在主峰——天柱峰巅上，亲眼目睹到通高0.55米、宽0.42米，镶嵌檐间竖悬铜铸鎏金的“金殿”匾额一方。此匾额那笔法劲健精密，一派矜重端肃、凛不可犯的气势，使林声的心头涨满了自豪和欣喜。

在回宾馆的路上，林声凝望方圆800里的重峦叠嶂、曲涧幽谷，回忆他与编委们，在考察工作中，从仓库的废料中、木工的斧锯下、厨师的砧板上，甚至从废物收购站的杂物堆中，把不少几近毁灭的匾额，逐一抢救出来，使其免遭粉身碎骨之灾的情景，一种从没有过的宽慰，油然而生。

“岁月栉风沐雨，工作飞星逐日。”一部艰苦浩大的工程接近了尾声。

林声的语调激昂奔放，“当我深夜终审500块名匾时，历史上名家才子、帝王将相、英雄人物汇集斗室，跃然纸上，其名匾生辉，光彩照人。手捧珍品，我彻夜难眠。我为伟大民族斑斓的传统文化而感到自豪，更为自己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尽一份气力而感到欣慰。”

一部凝聚着林声和其他编委心血的《中华名匾》于1992年8月在京举行了首发式。赵朴初老先生感慨地说，“《中华名匾》

的出版，为中华民族积了大德。”高占祥称《中华名匾》是补“匾文化”之空白，集匾书大全之作。

《中华名匾》发行仅几个月，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轰动效应。日本、台湾的知名人士纷纷来电求购这部精典。

《中华名匾》按类分为宫殿楼阁、院校堂馆、关隘城堡等11类，而每类又按年代排列，每块匾额都介绍了悬挂匾额建筑物的位置、匾额形态、书法分析及书写者的生平简介。它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向人们显示了历史文风、时政、地理、文学和书法艺术的变迁等等，成为今天人们研究民族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

林声同志一直从事文教领导工作，在文物考古、诗词吟咏、书法、主编新书等方面颇有建树，1000多万字的读物，淋漓尽致地抒写出他对生命的感受。他常说，做一位政府官员要具有文化修养，而他正是一位文化品位很高的政府官员。风韵犹存的林声，正在宏阔的文化视野中驰骋。



林声《国学粹中》演释古文”。林大丁思道以举中兴，而出附

## ●林 声 《中华名匾》跋

在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银河中，名匾犹如一簇簇耀眼的明星，光彩夺目，浩如烟海。它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民族文化遗  
产，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特有的艺术明珠。

我国的匾额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它把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中的辞赋诗文、书法镌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是美的综合结晶。匾额，以其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寓意，指点江山，评述人物，无论对缅怀古人，观光游览，都会给人以启迪，有着画龙点睛之功。加之它与中华民族的美感意识和审美情趣相协调，因而备受人们的钟爱。总之，一块名匾如同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一定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评价。以匾研史，可为佐证；以匾研诗，可得诗眼；以匾学书，可得笔髓。故可把名匾看作是历史的简论，诗书的精华，名胜的总纲，当然，也是研究美学的一个新径。

几十年来，我借工作之便曾游览拜读了一些名匾，每当我站在匾下，它那深奥哲理，简明教义，启我以智慧，享我以美艺，增我以国

思。我看到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几经折腾破坏和保护不善，逐年减少，殊感痛心。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传留后代，并进一步探索与发展匾文化，五年前便开始构思《中华名匾》一书的设计。其间，先后考察了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浙江、江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云南、海南、江西、广东、北京、上海等省市名山大川、古迹名胜的主要名匾，为编纂这本匾书，作了一些准备工作。近两年来，经过两次编委会议讨论研究，集全国专家学者之智，着手进行了名胜名匾、名人名匾和名字名匾为重点的匾志工程。由于这是国内第一部匾书，补白之作，又有抢救的性质，因而得到全国各方人士特别是文物界专家支持，经过编辑部和各省同志积极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普查、筛选和考证工作，收集了五百余块名匾。当我夜深终审这些名匾时，历史上名家才子、帝王将相、英雄人物云集斗室，跃然纸上，名匾生辉，光彩照人。手捧珍品，彻夜难眠，我为我们伟大民族斑斓绚丽传统文化而感到自豪，也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尽一份气力而感到无限欣慰。

出版《中华名匾》是弘扬匾文化的基础工作，但中国之大，一时很难收全，希望各省市的同行能在编纂此书的基础上出版省的匾志，以遗后人。同时我也建议成立中国匾文化研究会，积极开展中国匾文化的探讨工作，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同志应邀作为本书顾问，并亲自撰写了长篇序言，我国著名古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老先生作为本书顾问，帮助我们对所有名匾逐个做了考证鉴定，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搜集名匾，结集出版，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件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前无古人，缺乏经验，加之时间较紧，水平有限，难免搜集遗漏和考证不准，切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 彭图湘  
毛泽东恭写碑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一代伟人

毛泽东的如椽之笔留给锦绣中华多少珍贵的墨宝，难以数计，他为个人书写的碑文，却唯有一方，堪称一绝。有幸享受这等殊荣的不是达官显贵，而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湘西保靖县葫芦寨的袁吉六先生。

1868年古历4月，袁吉六先生诞生于葫芦寨袁家坪老屋。先生三岁失怙，家境贫寒，但自幼聪慧过人，且加倍勤奋，清光绪二十三年终成苗疆第一举人。尔后，袁吉六先生一领蓝衫，踌躇满志，离乡远行。

原湖南省副省长，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袁吉六先生于1913年春季到当时新建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国文教师。毛泽东是他教的预科第一班学生。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第一师范，袁吉六先生又是毛主席所在的第八班的国文教师，直到1918年毛泽东毕业时，前后达五年之久。袁吉六先生对毛泽东特别器重。经常约他谈话，介绍他读一些古典文学的作品。”